

朴实无华独自芳

——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李东朗教授



李东朗,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撰有《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史稿》(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等学术著作9部, 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第一卷)、《长征全史》等著作13部。主持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国家智库项目《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央党校科研优秀奖和多项其他省部级奖。

□ 张卫波

李东朗老师1988年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中央党校任教, 至今已经执教30年。

李东朗老师有深厚的学术涵养, 他史学功底扎实, 治学严谨, 持论客观, 勇于探索, 科研成果丰硕。通览李老师的研究成果, 有以下比较显著的特点。

一是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和对现实的作用。他在建党80周年之际发表的《赢得人民就赢得胜利》一文指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十分险恶、艰辛的条件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关键在于赢得了人民。人民群众是党战胜强大敌人的力量源泉, 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相结合, 就能赢得伟大胜利。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赢得人民仍是实现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最基本的条件。他所撰写的《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一文, 在阐述国共两党迥然不同的作风、产生迥然不同的作用与影响的同时, 指出应从“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历史中汲取经验, 增进对作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大力整顿党内作风,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第一卷), 详实阐述了党在局部执政的历史和经验, 因此被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图书馆评定为全国党员教育培训的优秀教材。

作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专家, 李老师特别重视发挥史学研究在与日本右翼势力斗争中的作用。针对日本国内有意回避和淡化裕仁天皇战争责任

的做法和观点, 他有理有据予以反驳: “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裕仁天皇, 对九一八事变的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事变的不断恶性发展和他的态度与决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是注重用历史发展潮流的大历史观观察历史。比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李老师有深入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发挥这样的作用, 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第一, 中日实力相差十分悬殊, 第二, 掌握全国政权和资源的国民党未能充分发挥其应发挥的作用, 第三, 中国共产党拯救国家和人民的政治追求。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 在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 倡言抗日、发动抗日, 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大力推动全国走向抗日。在全国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理论和游击战战略, 回答中国抗日战争怎么进行、前途如何和夺取胜利的问题, 为全国抗战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大规模开展抗日游击战, 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 并使之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和最活跃的战场, 成为打击、牵制和消耗日本帝国主义力量的主要阵地; 坚持、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凝聚中华民族力量, 顾全大局, 团结国民党抗战到底。国共两党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逆向发展, 国民党的作用由大渐小, 中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导。这个过程充满艰难、十分曲折, 而它的达成愈益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能量和先进性, “中流砥柱”恰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真实写照。

三是研究注重辨疑、释疑。运用史料解读历史, 是李老师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特别是针对互联网上对中共党史的歪曲和误解, 李老师析疑匡

谬, 着力颇多。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的规定, 曾引发许多议论。李老师考察史料发现两个问题: 一是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 仅限于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 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二是这个“最后决定权”从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成立生效, 到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决定, “在全会期间由全会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 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而停止使用, 存在的时间仅只是一年两个多月。他还根据其形成原因指出, 它是中共中央为适应抗战最困难时期的形势所采取的一种工作制度, 是改革和完善领导体制的一次尝试。再如“不抵抗主义”谁之过的问题, 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时明确承认“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 于是蒋介石与不抵抗主义无关的说法开始流行。李老师考证史料得出结论: 不抵抗命令确实出自张学良, 但张学良服膺蒋介石、东北外交完全归国民党中央办理的约定和蒋介石在万宝山事件后的“此非对日作战之时”的指示, 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正原因。

可以说, 李老师的研究合乎历史实际, 合乎逻辑, 辩驳性强, 有深度、有创新、有价值。

二

作为在党校讲坛辛勤耕耘30年的教师, 李老师为党校教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非常注重学科建设, 积极参与了上世纪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生课程的调整和完善工作, 建言献策, 延续至今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现代经济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

史、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等, 他是主要提议者和承担者之一。在教学中, 他非常注意讲授问题的系统性、基础性、历史性, 他认为如此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历史演变的脉络, 在努力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在历史演变大势中认识历史、评价历史, 总结经验和教训。他注重学术前沿问题和研究现状的剖析, 注重解惑释疑, 因此教学反映颇好好评。

非常难得的是, 李老师特别愿意毫无保留地与人分享自己的学术见解, 无论教员、学员和研究生, 但凡人有问题, 他都倾心与他们交流, 把自己的发现和研究心得讲给别人。中共党史教研部长期实行集体备课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他总是充分发挥雄厚的专业知识, 热心提出问题和建议。李老师先后指导了30余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 从学生毕业论文题目的选定、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以及论文的开题、写作、答辩等各个环节, 他都进行细致入微的指导。我曾经参加过李老师研究生的答辩, 发现他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 经常是逐页逐题提出问题和修改意见。不少学生在答辩前自我感觉不错, 但是面对李老师“铁证如山”的质疑, 也都开始认识到了论文中的缺点和不足。这对于研究生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习惯是十分有利的。目前, 李老师的大部分学生已经开始在工作岗位上发挥骨干作用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李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精心指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李老师为人谦逊朴实, 曾荣获中央党校“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研究生导师”等多项奖励和称号, 但他总是很低调, 也没有因此而松懈。

平时除了上课, 他主要时间都在办公室查阅资料和写作, 长年如此。年轻人见李老师如此刻苦, 总劝他歇一歇, 他只是默默一笑, 依然坚持如故。时间久了, 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要是不见李老师来办公室,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他之所以不断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涌现, 与他的谦虚和勤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曾经写过一首诗来描写向日葵: “朴实无华独自芳, 栉风沐雨阅沧桑。多经磨难难移志, 一片丹心永向阳。”这首诗用来形容李东朗老师也是十分合适的。这种朴实无华, 体现了他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和对党性原则的坚守。



党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 聂文婷

问题意识, 是学术研究应有的基本遵循。于党史研究方法而言, 何为问题意识? 笔者以为, 一是考问党史, 二是追问党史。

考问党史, 就是敢于向历史发声。当前有一些以学术研究之名的党史“作品”, 往往只是对既有史实的罗列, 或是对那些已有定论的再复制。也许研究者运用这些史料的目的仅仅在于为其“作品”支撑框架, 并不以此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即便如是, 难道就应该忽略对史料真实性的考问吗? 难道就应该完全依赖于已有党史书籍的史实叙述吗?

在这里, 略举一例。在1955年1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 中国作出了核决策。由于核决策的极端敏感性和高度机密性, 有关这次会议的档案资料尚未公布, 这就难免会产生一些“细节之谜”。例如, 这次会议作出的具体决策究竟是发展原子能, 还是研制原子弹? 对于这一

问题, 研究者一般会无意识地互换原子能和原子弹的概念, 这就使得很多研究自然而然地忽略了这一细节之谜的存在, 从而落得学术研究不准确、不严谨之嫌。再者, 在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党史书籍中, 有关这次会议参会人员记载是比较一致的: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均悉数到场。但实际上, 经过考证, 5位书记并未全部到会, 这就又推翻了关于这一历史细节的既有描述。

当然, 考问党史, 并不是要绝对挑战权威, 而是对党史起码的敬重。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考问党史, 再用确凿、详实的史实再现党史, 保持这样有益的互动, 并无限循环往复, 可以不断推出既有历史说服力、又有政治影响力的党史研究成果。

追问党史, 就是回溯历史“为什么”会发生。执政党的历史, 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它与生俱来就有深的政治烙印, 又无时无刻不为那时那刻的现实所关怀。因此, 用当代人的眼光回望党史, 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不

理解”。当我们认真分析这些所谓的“不理解”就会发现, 它们多集中于一些重大历史细节, 尤其以重大战略决策居多。而事实却是, 相关研究多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本身的宣传性研究, 或仅是对其产生的政治效应进行归纳总结, 较少对决策生成的来龙去脉进行历史性的分析。

我们仍然以作出中国核决策的那次会议为例。关于这次会议, 多数相关研究都将视线集中于会议本身, 即对会议进行身临其境式的细节描述。但是在这里, 忽略了一个隐藏于决策现象之下的事实: 一边是中国较为薄弱的科学技术、经济和工业基础, 另一边却是原子能研究与应用所需要的耗资巨大、技术高精、设备精良的要求。因此, 我们可以冷静追问: 中国核决策为什么生成于1955年? 中国的核决策究竟主要是自主性质的, 还是受外部因素的推动? 应该说, 对这些深层次问题的追问, 才是对这段历史真正的研究。

因此, 追问党史, 必须首先克服

党史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浮躁的、平庸的风气。回归史实本源, 追问历史为什么会生成, 即是历史追寻生成土壤, 用厚重的史料、丰富的档案构建党史生成与生长的根基。只有这样的党史“作品”, 才不失为一个党史研究者应有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古希腊作家卢奇安曾这样评价修昔底德: “他分清了好史家和劣史家的界限: 史家的作品应该成为千秋百世的财产, 而不应徒为目前沽名钓誉; 他们应该把信史留给后人, 而不应同今人哗众取宠。”“好史家”是把“信史留给后人”, “劣史家”是“为目前沽名钓誉”。当代人研究当代史, 不能忘记其学术初心和研究使命。不忘初心, 就是要做一个纯洁的党史研究者; 牢记使命, 就是要为历史正本溯源。



核心阅读

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 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 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

一切历史事物和现象, 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 在党史研究过程中, 只有坚持唯物史观, 尊重客观实际, 坚持实事求是, 才能得出符合唯物史观的结论。

学术评论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根本遵循。2010年, 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同志指出, 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 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 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

实事求是最早来源于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西汉初年, 经秦皇焚书坑儒和秦末战争, 典籍散佚, 河间王刘德“于灰尽之余冀亡散篇卷, 仅而复存”。刘德寻访典籍, 足迹遍布各地, 他亲自参与古籍整理, 态度极为严谨, 勘误订正, 精心校理。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评价刘德: “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 毛泽东把实事求是从治学态度“改造”成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发展, 实事求是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精髓, 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迸发出的灿烂思想火花。具体到党史研究, 实事求是是要遵循的首要原则。

党史研究坚持实事求是, 就是坚持科学的唯物史观。1942年,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 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唯物史观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路径, 社会历史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历史事物和现象, 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 在党史研究过程中, 只有坚持唯物史观, 尊重客观实际, 坚持实事求是, 才能得出符合唯物史观的结论。党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地揭示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从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的形成, 到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坚持以实事求是标准对党史进行概括和评述。在党史研究过程中对人对事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反对脱离历史条件, 反对简单化和绝对化。坚持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 做到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 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作具体深入的分析, 进而揭示历史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比如有关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 即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就是坚持用实事求是标准对党史进行概括和评述, 在党的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 起到了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的作用。

党史研究坚持实事求是, 就要高度重视史料的作用。史料是从事党史研究的基本条件, “巧

□ 姚利梅

党史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妇难为无米之炊”, 只有充分地占有史料, 才能开展好党史研究。在苏联剧变之后, 随着苏联档案的大量解密, 对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苏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涉及中共党史的一些问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观点, 从而使这方面的研究有不少的突破。但在史料的使用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

题, 如史料使用不规范, 不能根据史料得出真正客观的历史结论。要真正发挥好史料的作用, 一是要充分占有史料, 二是要科学地使用史料, 三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史料, 进而得出公正客观、恰如其分的结论。

党史研究坚持实事求是, 就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倾向。历史虚无主义违背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 混淆历史的支流与主流、现象与本质, 以偏概全,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时, 社会上还存在将党史演义化的倾向, 个别作者主观臆断, 虚构出许多细节, 捏造事实、扭曲真相。此外, 某些研究者因先入为主的观点需要和个人需要而不顾史实, 得出不符合实际的结论。党史研究有责任对这类现象进行批评和校正, 坚持实事求是, 还党史以本来面目。

综上所述, 党史研究任重而道远,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 才能真正发挥好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